

中国社会科学院
学者文选

贺

麟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贺 麟 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贺麟集/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ISBN 7-5004-5863-0

I. 贺… II. 中… III. ①贺麟—文集 ②黑格尔,
G. W. F. (1770 ~ 1831)—哲学思想—文集
IV. B516. 3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3961 号

责任编辑 周兴泉
责任校对 尹 力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一二零一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6.625 插 页 4

字 数 399 千字

定 价 41.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说明

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是根据李铁映院长的倡议和院务会议的决定，由科研局组织编选的大型学术性丛书。它的出版，旨在积累本院学者的重要学术成果，展示他们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就。

二、《文选》的作者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资深专家、学者。他们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三、《文选》中所收学术论文，以作者在社科院工作期间的作品为主，同时也兼顾了作者在院外工作期间的代表作；对少数在建国前成名的学者，文章选收的时间范围更宽。

中国社会科学院
科研局

1999年11月14日

前 言

贺麟(1902—1992)字自昭,四川金堂县人,是我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翻译家。他在我国老一辈哲学家中是较早接受系统的现代哲学教育的学者,早年考入清华学堂(清华大学的前身),曾师从梁启超学习中国传统哲学,向吴宓教授学习翻译。1926年赴美国留学,在奥柏林大学哲学系以优异成绩毕业后进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学习,获硕士学位后又去德国柏林大学继续深造。1931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他激于爱国热情中止学业回国工作。他在国外求学期间,广泛涉猎西方哲学各学派,并在怀德海、哈特曼等著名哲学家指导下进行研究工作。回国后他一直活跃在我国学术界,在哲学园地上辛勤地耕耘,先后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大等校任教,从事哲学教学和研究,发表了大量文章和一些有重要影响的著作,如《德国三大哲人处国难时的态度》、《近代唯心论简释》、《文化与人生》、《黑格尔逻辑学简述》、《当代中国哲学》等。他还曾主持“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的工作,组织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译作。1947年,他就任北京大学训导长直至解放。上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后,贺麟任中国科学院(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

主持西方哲学史研究工作，并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校讲授黑格尔哲学，对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研究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生前结集出版的著作有：《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黑格尔哲学讲演集》、《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等。在解放前的中国哲学界，贺先生是以真诚地信奉唯心论闻名的，曾被誉为“中国的费希特”。新中国成立后，他通过亲身的社会实践和学术研究，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的真理，经过痛苦的思索和自我批评，终于毅然放弃了长期信奉的唯心论，而皈依马克思主义，以八十高龄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那种对真理的无私追求，不断进行探索和思考，与时俱进的精神，正是体现了我国老一辈学者身上最可贵的品德。

关于这一文集的编选要作如下说明，贺麟先生学贯中西，对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都有精深的研究和很高的造诣。解放前他在许多著作中对中西哲学进行比较研究，对中外许多哲学家的思想作过深入的探讨，他力求以西方哲学为借鉴，吸取其精华，用以充实和改造中国哲学，力求达到二者的融会贯通，探寻一条发展中国哲学的新路，以弘扬我国的民族文化。解放后他主要精力用于研究西方哲学，特别是把黑格尔哲学作为研究的重点。他从早年起就对黑格尔哲学感兴趣，后来又为深入研究黑格尔倾注了毕生的精力，黑格尔哲学在我国的广泛传播和发生影响是和他孜孜不倦的努力耕耘分不开的。可以说，贺麟先生的黑格尔研究是他的学术生涯中最值得称道的哲学业绩，他也是我国哲学界公认的黑格尔研究权威。我们编选的这本文集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系列，根据该《文选》的编选要求，应以选收作者在中国社科院工作期间的代表作为主，因此这本文集除了收入贺麟先生解放前发表的少数几篇最有代表性的文章外，主要选收了他在20世纪50年代后论述黑格尔哲学的文章。那么，他在

黑格尔研究方面有哪些建树呢？

第一，贺麟先生是国内第一位真正全面系统地深入研究过黑格尔哲学的学者，对黑格尔学说他确实做到了他自己所提倡的“得其体用之全”、“得其整体”，他的许多精辟的见解正是以他对黑格尔哲学整体的深刻彻底的理解为基础的。一般人根据黑格尔《哲学全书》将其体系分为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三部分来阐述，贺先生则在研究方法上进行创新，把精神现象学作为整个黑格尔体系的第一部或导言，以逻辑学为体系的主干，而以应用逻辑学（包括自然哲学、精神哲学、法哲学、历史哲学、美学、宗教哲学、哲学史等等）为枝叶。这种划分法突出了精神现象学的地位和作用，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所说“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的重要意义，使人能更好地理解 and 把握黑格尔哲学的精神实质。

第二，贺先生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和讲解始终紧紧抓住辩证法这一核心。他认为，黑格尔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贯彻于整个体系之中的谨严精到的哲学方法，即辩证法。他多次强调，黑格尔哲学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体系，而在于方法，辩证法是其精髓所在。特别是他力图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去阐发黑格尔辩证法的重大历史意义，充分说明黑格尔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之一以及它和唯物辩证法的区别，因此他的研究成果也对广大读者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了贡献。

第三，在黑格尔哲学诸领域中，贺先生素以对精神现象学、逻辑学的精湛的研究闻名，他晚年又在我国率先进行黑格尔早期思想的研究。正是由于他的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推动了我国学术界对黑格尔早期著作的研究和重视，弥补了我国黑格尔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空白。青年时代的黑格尔深受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影响，对基督教权威持批判态度，主张社会政治改革，对

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进行深刻反思。贺麟先生通过对青年黑格尔思想的剖析，说明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形成过程，同时揭示了它所富有的批判精神。他还批判和纠正了一些西方著名学者如狄尔泰、克朗纳和卢卡奇等人对青年黑格尔思想的不正确解释，恢复事物的本来面目。

第四，还应该特别指出贺麟先生对黑格尔著作的翻译和出版所做的巨大贡献。黑格尔著作向以艰涩难懂著称，翻译之艰难不亚于专门的研究。翻译黑格尔的《早期神学著作》、《精神现象学》、《小逻辑》、《哲学史讲演录》等名著，花费了贺先生的大量精力和时间，正是通过他的忠实流畅的高质量译文，使我国广大读者得以享有阅读黑格尔原著的机会。他一直热心地推动黑格尔著作和其他西方哲学名著的翻译和出版工作，亲自撰写序言或评论，对读者正确地理解这些著作起了很大帮助作用。

最后，还要说明一点，《贺麟集》所选收的文章是他在不同时期内写的，由于历史的原因，某些文章中的提法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印记。为了保持文章的原貌，我们未作任何更改，请大家理解。

汝 信

2006年2月

目 录

前言	(1)
儒学思想的新开展	(1)
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	(16)
西方哲学的绍述与融会	(38)
黑格尔	(75)
黑格尔的时代	(120)
黑格尔的早期思想	(149)
黑格尔哲学体系与方法的一些问题	(166)
批判黑格尔论思维与存在的统一	(189)
《精神现象学》译者导言	(230)
关于黑格尔自然哲学的评价问题	(278)
黑格尔著《法哲学原理》一书评述	(312)
黑格尔著《哲学史讲演录》评介	(349)
布拉德雷逻辑思想	(380)
评缪尔的新黑格尔主义	(406)
新黑格尔主义批判	(431)

康德、黑格尔哲学在中国的传播

——兼论我对介绍康德黑格尔哲学的回顾 (464)

作者著译要录 (515)

作者年表 (517)

儒家思想的新开展

在思想和文化的范围里，现代绝不可与古代脱节。任何一个现代的新思想，如果与过去的文化完全没有关系，便有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绝不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文化或历史虽然不免经外族的入侵和内部的分崩瓦解，但也总必有或应有其连续性。

儒家思想，就其为中国过去的传统思想而言，乃是自尧舜禹汤文武成康周公孔子以来最古最旧的思想；就其在现代及今后的新发展而言，就其在变迁中、发展中、改造中以适应新的精神需要与文化环境的有机体而言，也可以说是最新的新思想。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里，我们可以得到现代与古代的交融，最新与最旧的统一。

根据对于中国现代的文化动向和思想趋势的观察，我敢断言，广义的新儒家思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潮。我确切看到，无论政治、社会、学术、文化各方面的努力，大家都在那里争取建设新儒家思想，争取发挥新儒家思想。在生活方面，为人处世的态度，立身行己的准则，大家也莫不在那里争取完成一个新儒者的人格。大多数的人，具有儒家

思想而不自知，不能自觉地发挥出来。有许多人，表面上好像在反对儒家思想，而骨子正代表了儒家思想，实际上反促进了儒家思想。自觉地、正式地发挥新儒家思想，蔚成新儒学运动，只是时间早迟、学力充分不充分的问题。

中国当前的时代，是一个民族复兴的时代。民族复兴不仅是争抗战的胜利，不仅是争中华民族在国际政治中的自由、独立和平等，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民族文化的复兴，其主要的潮流、根本的成分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假如儒家思想没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则中华民族以及民族文化也就不会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换言之，儒家思想的命运，是与民族的前途命运盛衰消长同一而不可分的。

中国近百年来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文化上有失调整，就不能应付新的文化局势。中国近代政治军事上的国耻，也许可以说是起于鸦片战争，中国学术文化上的国耻，却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儒家思想之正式被中国青年们猛烈地反对，虽说是起于新文化运动，但儒家思想的消沉、僵化、无生气，失掉孔孟的真精神和应付新文化需要的无能，却早腐蚀在五四运动以前。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生活上失掉了自主权，丧失了新生命，才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危机。

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一个大转机。表面上，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打倒孔家店、推翻儒家思想的一个大运动。但实际上，其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功绩与重要性，乃远远超过前一时期曾国藩、张之洞等人对儒家思想的提倡。曾国藩等人对儒学的倡导与实行，只是旧儒家思想的回光返照，是其最后的表现与挣扎，对于新儒家思想的开展，却殊少直接的贡献，反而是五四运动所要批判打倒的对象。

新文化运动的最大贡献在于破坏和扫除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躯

壳的形式末节，及束缚个性的传统腐化部分。它并没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学术，反而因其洗刷扫除的工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显露出来。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以打倒孔家店相号召的胡适先生，他打倒孔家店的战略，据他英文本《先秦名学史》的宣言，约有两要点：第一，解除传统道德的束缚；第二，提倡一切非儒家的思想，亦即提倡诸子之学。但推翻传统的旧道德，实为建设新儒家的新道德做预备工夫。提倡诸子哲学，正是改造儒家哲学的先驱。用诸子来发挥孔孟，发挥孔孟以吸取诸子的长处，因而形成新的儒家思想。假如儒家思想经不起诸子百家的攻击、竞争、比赛，那也就不成其为儒家思想了。愈反对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愈是大放光明。

西洋文化学术大规模的无选择的输入，又是使儒家思想得到新发展的一大动力。表面上，西洋文化的输入，好像是代替儒家，推翻儒家，使之趋于没落消沉的运动。但一如印度文化的输入，在历史上曾展开了一个新儒家运动一样，西洋文化的输入，无疑亦将大大地促进儒家思想大考验、大关头。假如儒家思想能够把握、吸收、融会、转化西洋文化，以充实自身、发展自身，儒家思想则生存、复活而有新的发展。如不能经过此考验，度过此关头，它就会消亡、沉沦而永不能翻身。

所以儒家思想是否能够有新开展的问题，就成为儒家思想是否能够翻身、能够复兴的问题，也就是中国文化能否翻身、能否复兴的问题。儒家思想是否复兴的问题，亦即儒化西洋文化是否可能，以儒家思想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是否可能的问题。中国文化能否复兴的问题，亦即华化、中国化西洋文化是否可能，以民族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是否可能的问题。

就个人言，如一个人能自由自主，有理性、有精神，他便能以自己的人格为主体，以中外古今的文化为用具，以发挥其本

性，扩展其人格。就民族言，如中华民族是独立自主、有理性有精神的民族，是能够继承先人遗产，应付文化危机的民族，则儒化西洋文化，华化西洋文化也是可能的。如果中华民族不能以儒家思想或民族精神为主体去儒化或华化西洋文化，则中国将失掉文化上的自主权，而陷于文化上的殖民地。让五花八门的思想，不同国别、不同民族的文化，漫无标准地输入到中国，各自寻找其倾销场，各自施展其征服力，而我们却不归本于儒家思想而对各种外来思想加以陶熔统贯，我们又如何能对治这些纷歧庞杂的思想，而达到殊途同归，共同合作以担负建设新国家新文化的责任呢？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人是否能够真正彻底、原原本本地了解并把握西洋文化。因为认识就是超越，理解就是征服。真正认识了西洋文化便能超越西洋文化。能够理解西洋文化，自能吸收、转化、利用、陶熔西洋文化以形成新的儒家思想、新的民族文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不是建立在排斥西洋文化上面，而是建立在彻底把握西洋文化上面。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是在西洋文化大规模的输入后，要求一自主的文化，文化的自主，也就是要求收复文化上的失地，争取文化上的独立与自主。

根据上面所说，道德传统的解放，非儒家思想的提倡，西洋文化的输入与把握，皆足以促进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兹请进而研讨儒家思想新开展所须取的途径。

不用说，欲求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在于融会吸收西洋文化的精华与长处。西洋文化的特殊贡献是科学，但我们既不必求儒化的科学，也无须科学化儒家思想。因科学以研究自然界的法则为目的，有其独立的领域。没有基督教的科学，更不会有佛化或儒化的科学。一个科学家在精神生活方面，也许信仰基督教，也许皈依佛法，也许尊崇孔孟，但他所发明的科学，乃属于独立的公

共的科学范围，无所谓基督教化的科学，或儒化、佛化的科学。反之，儒家思想也有其指导人生、提高精神生活、发扬道德价值的特殊效准和独立领域，亦无须求其科学化。换言之，即无须附会科学原则以发挥儒家思想。一个崇奉孔孟的人，尽可精通自然科学，他所了解的孔孟精神与科学精神，尽可毫不冲突，但他用不着附会科学原则以曲解孔孟的学说，把孔孟解释成一个自然科学家。譬如，有人根据优生学的道理，认为儒家所主张的早婚是合乎科学的。或又根据心理学的事实，以证明纳妾制度也有心理学根据。甚或根据经济学以辩护大家庭制符合经济学原理。亦复有应用物理学、化学的概念，以解释《易经》的太极阴阳之说的。诸如此类假借自然科学以为儒家辩护的办法，结果会陷于非科学、非儒学。这都是与新儒家思想的真正发展无关的。我们要能看出儒家思想与科学的息息相关处，但又要能看到两者的分界处。我们要能从哲学、宗教、艺术各方面以发挥儒家思想，使儒家精神中包含有科学精神，使儒家思想足以培植、孕育科学思想，而不致与科学思想混淆不清。

简言之，我们不必采取时髦的办法去科学化儒家思想。欲充实并发挥儒家思想，似须另辟途径。因儒家思想本来包含有三方面：有理学以格物穷理，寻求智慧。有礼教以磨炼意志，规范行为。有诗教以陶养性灵，美化生活。故求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第一，必须以西洋的哲学发挥儒家的理学。儒家的理学为中国的正宗哲学，亦应以西洋的正宗哲学发挥中国的正宗哲学。因东圣西圣，心同理同。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的哲学与中国孔孟、老庄、程朱、陆王的哲学会合融贯，而能产生发扬民族精神的新哲学，解除民族文化的新危机，是即新儒家思想发展所必循的途径。使儒家的哲学内容更为丰富，体系更为严谨，条理更为清楚，不仅可作道德可能的理论基础，且可奠定

科学可能的理论基础。

第二，须吸收基督教的精华以充实儒家的礼教。儒家的礼教本富于宗教的仪式与精神，而究竟以人伦道德为中心。宗教则为道德之注以热情、鼓以勇气者。宗教有精诚信仰、坚贞不二的精神；宗教有博爱慈悲、服务人类的精神；宗教有襟怀广大、超脱尘世的精神。基督教文明实为西方文明的骨干。其支配西洋人的精神生活，实深刻而周至，但每为浅见者所忽视。若非宗教的知“天”与科学的知“物”合力并进，若非宗教精神为体，物质文明为用，绝不会产生如此伟大灿烂的近代西洋文化。我敢断言，如中国人不能接受基督教的精华而去其糟粕，则绝不会有强有力的新儒家思想产生出来。

第三，须领略西洋的艺术以发扬儒家的诗教。诗歌与音乐为艺术的最高者。儒家特别注重诗教、乐教，确具深识远见。惟凡各种艺术者皆所以表示本体界的意蕴，皆精神生活洋溢的具体表现，不过微有等差而已。建筑、雕刻、绘画、小说、戏剧，皆所以发扬无尽藏的美的价值，与诗歌、音乐亦皆系同一民族精神及时代精神的表现，似无须轩輊于其间。过去儒家因乐经佚失，乐教中衰，诗教亦式微。对其他艺术，亦殊少注重与发扬，几为道家所独占。故今后新儒家的兴起，与新诗教、新乐教、新艺术的兴起，应该是联合并进而不分离的。

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谐合体。因此，新儒家思想的开展，大约将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的途径迈进。有许多人，拾起“文人无行”、“玩物丧志”等语，误认为儒家轻蔑艺术。或只从表面去解释孔子“敬鬼神而远之”，“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等语的意义，而否认孔子有宗教思想和宗教精神。或误解“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一语，而谓孔子不探究哲学。